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基于后发展理论的分析

贾永堂，罗华陶①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建设过程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高等教育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这种赶超型发展特色源于初始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后发展理论看来，落后国家要成功摆脱边缘化困局，必须在初始阶段实现与国际体系的隔断，并在合适时机重新融入国际体系。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恰恰经过了与国际体系隔断与融入两个阶段，它们从不同方面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理性发展，必须着力推进高等教育宏观治理转型，进而实现高等学校发展的转型。

关键词：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道路；后发展理论；理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5-0001-12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China: Analysis from the Theory of Late Development

JIA Yong-tang, LUO Hua-tao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became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journey of higher education backward country catching-up the developed country. Such catch-up development had it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due to the choice of the initial path. From the late development theory, to get rid of the marginalization, the backward country must separat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initial phas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gain at the right moment. Exactly,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experienced such two phases of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shaped the development path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s the backward country,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croscopical govern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atch-up development path; late development theory; rational development

①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80051)
作者简介：贾永堂(1965—)，男，湖北房县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理论、高等教育史研究；罗华陶(1972—)，男，湖北利川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理论、教师教育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近年来，学界从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到实践、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办学、从精英到大众化、从社会职能到改革与发展诸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广泛探讨，在确认高等教育取得伟大成就与存在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综观当前学界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发展模式、成就与问题以及具体实践等方面，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如何选择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及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应选择何种道路等一系列问题缺乏关注。本文尝试以后发展理论为基础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深入探讨，重构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并为未来高等教育选择理性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一、亢奋与躁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浓厚赶超色彩

从1949年起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过程始终饱含着一种加快赶超发达国家的冲动，这可从长期延续下来的话语与现象得到印证，如对超高目标提法的普遍偏好、对快速发展的执着追求、对“超常规”发展方式的刻意强调、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战略的反复运用、对发展绩效的过度关注等。

1.体现浓厚赶超色彩的话语与现象

第一，对超高目标提法的普遍偏好。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直至高校层面都特别热衷于提出超高目标。在国家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在提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宏伟目标[1]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这种超高目标；在区域层面上，几乎所有省份都提出了包括创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与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中长期目标；在学校层面上，116所“211”高校中有59所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应该说，国内确有少数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部分大学与“一流”的差距相对较小，提出赶超战略确有合理之处。但一些教育落后省份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与“一流”的差距实在太大，但也追赶潮流并提出赶超一流的超高目标，实属冒进之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目标或许具有激励作用，但当人们频繁面对不断推陈出新而实际上难以实现的远大战略目标时，其激励作用必然会打折扣，其社会效用也很难充分发挥出来。“211工程”、“985工程”以及类似计划都提出在短期（一般不超过30年）内建成一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些目标似乎大多难以如期完成。

第二，对快速发展的执着追求。这主要表现在伴随高目标而制订严格的时间表上。从“211工程”和“985工程”提出尽快建成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再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等，都体现出对建设与发展速度的追求。更有甚者，很多目标往往还被要求提前、超额实现。比如，从1999年到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等多项指标的实际增长就超越了多项政策目标。[2]最新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表现出加快建设的取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曾就该方案作过如下阐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分三步走，分别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3]可以看出，国家已经制定了严格、详尽的时间表，在每个时间区间都有明确的发展任务和目标。

第三，在发展方式上刻意突出“超常规”。对发展速度的过度追求，以及遵循规律的常规发展方式往往难以满足决策者的需求，相应催生了不顾条件约束而刻意强调超常规发展的政策理念与实践。在现实中，超常规发展往往与跨越式发展相提并论。超常规发展的实质是有规律不去遵循、有经验不去借鉴，期望通过走捷径来实现宏大目标。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继续并加快进行‘211工程’建设”，这似乎表明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度可以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微观办学层面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高校在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时普遍喜好使用“跨越式发展”一词。跨越式发展的实质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时间积累和前置条件，跨越事物发展的某些阶段，以满足人的主观愿望。在高等教育领域，对跨越式发展的偏好甚至塑造了我国高等教育特定的高速度、低水平与粗放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型的发展方式，并造成了对运动式治理的依赖。

第四，举国体制的蔓延。对于高远目标、高速度和超常规的追求，导致了高等教育领域中举国体制的蔓延。现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创办一流大学、培养拔尖人才的速成项目。在国家层面，政府出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计划”以及各种重点学科和工程中心建设计划等，包括近期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在高校层面，很多高校都表现出浓厚的“重点建设”取向，不仅重点大学普遍热衷于举办精英学院，甚至一些层次并不高的大学也有类似追求。这些“工程”本质上都是集中国家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国家、高校均希望借此“砸出”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可以看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及其实施，并没有走一条“从整体进取中获得高水平大学脱颖而出”的道路，而是重点地、刻意地扶持某些高校或者学科。这种战略思想经过多年的反复强化已成为一种制度依赖和习惯，并且已蔓延至各个层面，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作为后发国家，如果希望在落后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就只能走一条道路，即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国外知名的哈佛、耶鲁大学还是 1949 年前的北大、清华等知名大学，皆非重点建设的成果。

实际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遵循一条通则——万丈高楼平地起。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真正重视基础教育。因为要使高等教育得到有效发展，就必须重点培植文化根基，着力提升国民素质，而文化根基、国民素质的培植或提升渠道当然是基础教育。另一方面，只有在整体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高水平大学的崛起。我们必须意识到，真正的高水平大学是在与众多高校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

第五，对发展绩效的过度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各行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双重压力，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绩效，以解决民生和国际压力等问题。从“一五”计划（1953－1957 年）提出工业增速、超英赶美，到“二五”计划（1958－1962 年）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贯穿其中的都是发展至上的理念。如今，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就。但是当社会各领域把这种绩效至上的发展主义思想运用于实践中时，极有可能使发展走向异化，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后果。当其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对办学规模、占地面积、成果数量、就业率等数量指标的追求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这种过度关注数量目标的外延式发展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低度现代化治理。

第六，政府过度主导。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普遍采用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曾创造了“东亚奇迹”[4]，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随着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暴露出来，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正是得益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的扩张性投资。但政府偏好 GDP 的数量而非经济质量，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已经演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并未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反而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5]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也早已推及高等教育领域。1952 年的院系调整、1999 年的大学扩招、“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计划”以及大学的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大学校长的任命、教师职称的评定等，都是由政府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实施的。客观而言，在现代化建设初期，这种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对于中国这个后发国家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存在着若干后发劣势，比如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起点过低、资源与人才紧缺、国际环境复杂等，这些劣势使得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像发达国家那样在不断试错中发展，因而选择由政府主导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或许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实行这种体制的代价是巨大的，如在高等教育领域，长期的政府主导使得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越来越微观化，使高等学校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受到抑制。

2. 赶超情结的历史根源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浓厚的赶超情结源于最初的路径选择。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启动了向西方各国学习、模仿与借鉴其先进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与制度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道地的舶来品”，虽然 19 世纪末康有为提出“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最终还是只能师法日德。[6]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集三种不同的传统于一体，第一种传统是从民国时代传承下来的移植在古代儒学基础上的现代西化教育，第二种传统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政府的经验，第三种传统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引入的苏联模式。[7]正是在这三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传统各自的影响及其变幻不定的结合方式中，孕育了新中国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的种子。

如果说1952年以前的发展历史与当时的选择是当代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道路的起点，那么可以认为，“一五”计划提出的工业增速和超英赶美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赶超发展道路的基本格局；“二五”计划期间的“大跃进”则强化了这一道路；十年“文革”又导致高等教育的大退步，使得“拨乱反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赶超发展的情结越来越浓厚，并一直延续至今。

哈罗德·珀金曾经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从中世纪到20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有四个重要阶段或转折点：作为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独特机构的大学的产生；近代欧洲初期的大学兴衰；德国大学的转变及其对英、美、日等国的影响；作为后工业社会轴心机构的大学。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和命运。

二、有必要基于后发展理论重构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

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对其成败得失的评价，学界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经过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构建起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功能先进、影响深远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8]；有的学者则更着眼于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如高等教育改革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无约束性，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往往不计成本，不受约束和问责，改革与发展成效也无法检验等。[9]客观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如果过分拘泥于对特定时期高等教育具体发展成就与问题的论争，那就难免陷入就事论事式的评头论足，不利于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深层反思。或许我们应该基于更广的历史视野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从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角度出发去探讨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从总体上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评判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成败得失。如果我们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纳入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我们或许能够对这60余年的发展做出更准确的评价。

二战结束后，和平发展成为多数国家的主题。在这种背景下，后发展理论得以兴起，并首先形成了右翼发展理论。该理论主张，后发展国家应融入发达国家所塑造的国际体系，走领先国家指引的道路，通过学习先进经验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现实中，后发国家的跟随性发展往往受挫，无法转型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左翼的“依附论”因此随之风行。这一理论认为，正是与先发国家建立的强势“中心”之间的紧密联系，导致了背负后发劣势的国家处于“边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沦为附庸，因此，“边缘”应与“中心”脱钩。[10]

鉴于右翼理论假定了某种普适的线性演进路径，简化了复杂的发展进程及其国际环境，而左翼理论预设了高度结构化的世界体系，甚至假定了某种“零和”性质的国际关系，各有其局限。迪特·森哈斯力图超越二者去探索发展道路问题，尤其是在其他国家领先的情况下，落后国究竟应当如何实现追赶式发展。一方面，他观察到第三世界长期以来无可逃遁的边缘化压力；另一方面，他试图证明，即使是如今的发达工业国，在其早期发展历程中也曾面临沦为附庸的现实危险，这些国家纯粹由于应对得法，才摆脱了厄运。反过来，当今不少欠发达国家其实也有过足以转机的历史条件，无奈由于应对不当而错失发展良机。因此，森哈斯认为，我们既不要低估落后国所面临的边缘化危险，也不应以宿命论态度来看待发达或欠发达问题，而应研究要实现后发展理当具备或创造何种条件。他提出了影响后发展命运的四个变量，强调后发国家是否有意识且有能力采取“隔断(dissociation)”发展战略可能决定其发展命运，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实乃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行不通后的一种应急选择。森哈斯还进一步揭示了后发国家走出边缘化困局的若干道路，并指出在世界发展史上更常见的是“陷于边缘化而不能自拔”的失败道路。[11]

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所走的发展道路正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一条道路，因此，应该从后发展理论的角度去深入考察。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赶超型发展道路

1. 选择初始发展道路的历史背景

(1)直前式社会剧变是选择高等教育初始发展道路的重要背景。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会变迁理论认为，如果社会系统发生剧变的主题或重心始终如一，并且所发生的剧变是急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那么这种变迁就是“直前式社会剧变”。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就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新中国不仅力图实现本国的独立自主发展，而且力图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集体就有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即先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行物质与精神条件的建设，在完全成熟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12]但事实上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成，仅仅经历了3年时间。期间的一个核心发展主题可以概括为“赶超式”的“向社会主义跨越”。由这种直前式社会剧变所完成的国家建构，决定了国家的基本发展图式，相应地决定了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道路：通过彻底破坏既有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高等教育的重构。

(2)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除了政治因素，社会、经济等因素也直接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刚建立的新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农业、工业和商业水平普遍低下，这既决定了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支持，也决定了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可能提出的要求。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农业国状态，到1949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10％左右，其余90％左右为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1949年全国解放时，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粮食和大豆产量降低了25％，工业生产降低了50％。工农业生产衰落、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降到了极端低下的水平。[13]党所提出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远大目标与落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脱离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走独立发展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3)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评估，也可以从某个重要的方面进行考察，比如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和结构安排、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总规模和高校办学水平等方面。新中国建立之初，原有高等教育的基础总体上是非常薄弱的，虽然初步建立了现代学术体系和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批高校达到了较高学术水平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但也存在巨大不足：一方面，高校数量过少，全国仅有227所高校(不含台湾高校)，其中，公立高校、私立高校和教会设立的高校分别为138所、65所和24所[14]；另一方面，这些高校的地域结构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再就是高等教育规模过小，在校生数仅为11.7万人，毛入学率极低，仅达到0.26％。[15]面对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体系，具有远大抱负的新政府选择对其进行全盘重构也在情理之中。

2.走上与世界高等教育主流体系相隔断的赶超型发展道路

(1)对原有高等教育体系的颠覆性重构：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

在脱离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高等教育体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道路的大局基本确定之后，新中国开启了彻底重构高等教育的进程。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会议还确定了坚决改造旧教育和逐步实现新教育的基本原则。1952年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决定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对民国时期留下来的高校进行调整，结果是肢解了民国时期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次调整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销了一批名不副实的高等学校和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了24所教会大学，就连当年名噪一时的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和震旦大学等名校都未能幸免。几乎与院系调整同步，国家直接集中计划、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的高等教育体制被建立并实行，以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基本被忽略。应该说，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以那种独特方式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向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激进过渡之时，就已经种下了日后反复跃进的种子。熊彼特在其后期著述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破坏旧的经济结构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经济结构。[16]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到进入社会主义之前这一阶段对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归为某种意义上的“破坏性创造”，就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创造而言，它当然是一种“立”，相对于粗具现代高等教育规模的原有高等教育体系而言，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破”。

(2)启动低水平高速赶超模式：高等教育大跃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完成对原有高等教育体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全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后，伴随着各行各业的大跃进，高等教育领域也启动了激进赶超模式。1958 年 3 月，时任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个专区办几所大学；在同年 4 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用 15 年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4 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教育时说，可否先用 15 年普及，再用 15 年提高。[17]6 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18]。伴随着这些指示，高等教育开始突飞猛进：1957 年全国高等学校有 229 所，到 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19]，比 1957 年增长 462.8%。在这一阶段，全国各地还建立了 23500 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20]大跃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这一短暂的理性发展阶段。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激进赶超并没有一个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导，也没有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师资力量、办学经费、教学及科研场所及硬件建设还十分滞后。因此，这一时期启动的是一种低水平赶超模式。

3. 切入“随意创造”模式——完全脱离世界高等教育主流体系的高等教育大革命

“文革”时期，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不但经历了造反、夺权、内斗和清查队伍等种种干扰，还经历了搬迁、改制、合并、撤销等种种折腾。这一时期，一场毁灭性的高等教育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国高等教育既完全脱离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体系，也基本切断了与刚建立起来的仿苏体系的联系，走上了超前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高等教育你追我赶，存在着一种竞争态势，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为了赢得与资本主义乃至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已经完全脱离竞技场，走上了一条既与传统隔断、也与外界经验完全隔断的孤立发展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切入一种“随意创造”模式。这种“随意创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对传统高等教育的否定与取消。毛泽东在《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中分别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1]显然，这是以政治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希望通过直接实践将学生培养为实干型人才。按照指示精神，一场高等教育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来临，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体系被彻底砸乱。接着，“两个估计”也登上历史舞台。1971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认为，“文革”前 17 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22]“两个估计”实质上是对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的教育进行了全面否定，导致对高等教育的颠覆性重构，其后果极为严重。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从停止招生到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文革”开始后，高校被迫停止全面招生，虽然于 1970 年和 1971 年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但规模有限，估计在这一时期全国高校少培养了数百万本专科毕业生和十万名以上的研究生。同时，高校的数量也急剧减少，到 1971 年只剩下 328 所。[23]“文革”对教育的破坏还体现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这场延续十余年的社会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反修”“防修”建立和巩固政治新秩序，但结果是使大部分“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给青年和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24]

第三，各省党政部门主导高校大撤并。高等教育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撤并高校。在这场撤并行动中，首当其冲的是文史类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外交学院都被撤销，而留下来的理工科学校和专业则被赋予实用性功能。这一时期，四川和山东等省推动过多起典型的撤并运动。比如，1971 年 9 月，四川省决定将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四川林学院、西南民族学院撤销。又如，1970 年 6 月，山东省将山东大学理科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山东师范学院迁往聊城；山东医学院与山东中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医学院；山东煤矿学院迁往肥城矿区；撤销山东财经学院。

第四，大学教育教学的另类改革。1967 年 1 月，“夺权”之风蔓延全国，出现了严重的动乱局势。为了应对这种局势，3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25]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但学校（包括高校）教育教学的正常功能基本上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所谓的教育教学改革。同济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可算是其中的典型。1967年10月9日，“五七公社”在同济大学正式成立，其设想是将学校、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三结合”办学，但这一教改方案片面地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排斥知识分子，把学校办到工地上，以阶级斗争、大批判为主课，不讲基础理论和课堂教学，大搞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系统的基础理论教学被否定。“五七公社”还进行所谓的“教学体制和专业设置改革”，废除了教研室，同时改造原有专业，如把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城市规划4个专业改造为房屋建筑专业，并且不区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将两类课程混在一起，搞“专业连队”和“厂带专业”的体制改革。[26]“五七公社”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教学体制，把一个大学系级建制变成了一个军事编制。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更像是一种“随意创造”，既无视所有传统，也蔑视所有国际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完全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主观想象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试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算是我国高等教育进行“隔断”式发展的一种探索，跟发达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和历史经验也不一样。

4.回归理性发展模式——走上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主流的赶超道路

（1）回归国际主流体系：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

“文革”期间发生的高等教育大革命在本质上是对正常文化教育的革命，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大倒退，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极大损失。1977年邓小平接手主管教育工作后，在高等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并立即恢复了高考制度，当年12月就有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27]1979年3月，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报告，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明确了教育与科学的地位，肯定了教师和科技工作的作用，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教学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学位制度也得以建立起来，多层次的、开放性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得以形成。[28]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也逐渐从封闭的本土化向开放的国际化迈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我国就于12月26日向美国派遣了首批52名留学人员，从此打开了中国高等教育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29]此后10年间，中国与美、英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的协议，每年向国外派出3000名留学生。[30]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2）重启激进赶超模式。

1978年底到1979年，邓小平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于1982年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为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道路。[31]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教育被纳入经济赶超的轨道。1983年国家批准了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同年5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要加快调整步伐，加快发展数量；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建成科类齐全，层次、比例合理的体系，总规模达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当的水平”[32]。这些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期待着高等教育能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在这种大气候下，我国高等教育从宏观到微观层面都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对策，其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部分高校举办“少年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一般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科技大学创办的“少年班”。1978年2月，中科大向中国科学院提交创建“少年班”的申请并于3月9日得到教育部的批准，随后招收了首批21名11－22岁的“少年班”学员。尽管从一开始“少年班”就遭到质疑，但在国家高层的支持下，最终还是在中科大以一个内部正式组织的建制存留下来。之后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北大、清华等全国13所重点高校也开办了“少年班”。[33]这可以说是中国在人才培养上实行激进赶超的典型实例。二是重点建设的强化。新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重点建设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战略。早在1954年，我国政府就明确制定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计划，确定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学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在资源和政策上给予特殊关照。此后，重点大学建设政策一直持续下来，获得支持的重点大学数量也持续扩大，到1963年达到48所。1978年后，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建设得到恢复，当年确定88所学校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点大学，占全部405所高校的2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建设就被纳入国家年度建设和中长期建设计划从而不断被强化，在政策扶持下，重点大学大多获得了超过普通院校的办学成就，赢得了较大竞争优势，但正因为这种优势主要来自政策，因此对其他高校的正面带动作用非常有限。而在基础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等教育办学基础薄弱、政府总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不断强化重点建设无疑带有激进赶超色彩。

(3)再次切入加速赶超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高等教育被纳入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范围而受到更有力的支持。在人们热议"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话题的过程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命题先后被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逐步进入"加速赶超模式"。除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外，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推动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建设，同时，各种人才计划也应运而生。这些重点建设的速成项目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全覆盖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体系，也成了全国高校竞相争取的重要资源。但这些项目似乎并没有发挥出以点带面的功效，在某些时候反而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极大地抑制了普通高校的发展。

此外，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加速赶超的另一大内容。高校扩招是自1999年开始实施的、以快速扩大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在多项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从1999年到2014年短短15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普通高校数从1022所增加到2529所，校均规模由3335人增加到9995人，普通高校招生数从108万人增加到721万人，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由341万人增加到254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0.8%增加到37.5%。这种高速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相关建设的滞后，高校扩招带来了高等教育质量滑坡和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一轮院校合并更像是1952年那场"破坏性创造"运动的翻版，实际上也是赶超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分别是1952年到1957年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校调整、从大跃进到1961—1963年的调整、"文革"期间"两个估计"错误论断之下的调整、"文革"结束后1978—1984年的调整、1992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大调整、大合并。[34]这些调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原有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破坏性创造"。开始于1952年的那场调整，"破"了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学校组织结构，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体系。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体系被认为存在结构、层次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再次被调整，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院校合并[35]，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超大规模和复杂层次的巨型大学。同以往一样，这次高校合并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和不改善教学条件的前提下进行的大学提升运动，虽然起到了整合人力、财力等资源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一批颇具特色的高校的消亡，负面效果十分明显。

5.对新中国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道路的总结

(1)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这段历史往往被视作一个独立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依然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受此前发展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等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机构的新式学堂先后建立起来，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一批粗具现代大学雏形的高等学校的建立，以及"癸卯学制"的颁布，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主要以日本为学习对象开启了制度与组织上的现代创制。辛亥革命后，随着"壬子—癸丑学制"和《大学令》、《大学规程》等政策法规的颁布，中国高等教育初步完成了顶层设计。以德国大学为榜样的北京大学和以美国大学为榜样的东南大学等现代高等学校先后崛起，20年代后甚至出现了短期的群体繁荣局面。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将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特定的内外部环境，此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几乎选择了半个世纪前的发展道路：学习借鉴的对象由欧美先进国家转而集中到苏联一家，政府全面接管高等教育，形成了政府主导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1978年后，高等教育再次打破封闭模式，走向融入世界主流体系的发展道路。如果把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纳入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全程，我们就会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从被迫开放(无意识的博采众长)到单纯以日本为师，再到全面学习欧美的相对开放，转到全面学苏的完全隔断，最终演化为融入世界主流体系的开放式发展。

(2)总体上走的是一条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赶超型发展道路。

从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出现过短暂的理性发展阶段，但基本上走的还是以快速赶超为目标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接收和改造旧教育，对原有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彻底改造，走上了全盘学苏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大跃进时期为了迎合当时超英赶美的政治潮流，全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办大学的竞赛运动，炮制了大量根本算不上是大学的大学，扰乱了高等教育秩序；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可算是对此前激进赶超的一种理性调整，但为时过短；“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完全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走上了既轻视经验也蔑视传统、同时无视规律的超前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终于摆脱孤立发展状态，重新走上融入国际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道路，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指导下，高等教育逐步走上服务于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纪末走上加速赶超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展国家的中国，由于自身基础条件的不足，为了实现阶段性的但却相对高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往往倾向于走加速赶超的发展道路。

(3)赶超型发展的基本逻辑。

国家推动产业赶超是二战后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36]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包括横向的不平衡性，也包括纵向的不平衡性。前者是指世界各国的发展不平衡，后者是指各国在发展历史中的非均衡性。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虽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加速发展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37]由于在资源、制度、科技等方面落后，为了实现赶超，后发国家唯有选择由政府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关键领域，以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关键领域的赶超。现代国家都已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在一国发展中的关键性地位，因此大多倾向于选择部分关键领域去重点发展，以实现高等教育总体水平达到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最终目的。这种赶超的精髓在于政府基于远大目标而对高等教育活动进行全面设计和严格控制。赶超催生了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强化了赶超效应，这种相互强化往往诱发出激进赶超实践。

(4)赶超道路分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1949—1977年为与世界主流体系日益隔断的赶超阶段，1977年以后为融入世界主流体系的赶超阶段。

如前所述，在影响后发展国家命运的四个变量中，森哈斯特别强调“是否有意识且有能力采取隔断发展战略”。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其他领域也相当落后，再加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国际舞台上很可能倾向于选择自我边缘化策略。既然当时国际国内大格局已经注定中国既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格局，也不可能进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发展体系，就只能进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发展体系。最终，新中国选择以苏联为模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隔断”式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旧教育的颠覆性重构上。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从整个高等学校体系到办学模式乃至课程教材教法都选择了苏联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联系基本被隔断。进入“大跃进”时期后，我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194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逐步走上完全按照主观愿望办高等教育的道路。到“文革”时期，进一步走上了“随意创造”的道路，最终招致总体性失败。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改变发展路径的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逐步走上融入国际高等教育主流体系的发展道路。

(5)在赶超型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高等教育选择了不同的主流发展模式。

首先开启的主流模式是1949—1956年的“破坏性创造”模式：为了创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破坏了好不容易发展起来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二种主流模式是1957—1960年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激进赶超模式：不顾发展基础和客观条件制约，提出超高目标并立即付诸实施；第三种模式是1966—1976年“文革”时期的“随意创造”模式：既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也隔断与国际主流高等教育体系的联系，完全基于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主观想象办高等教育；第四种模式是1961—1963年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理性发展模式：激进赶超受挫后回归常识和规律的常态发展。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大多数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前三种模式，只有激进赶超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才可能启动理性发展模式，而这种理性发展模式仍然带有浓厚的赶超色彩。

四、对我国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历史的反思

1. 从后发展理论的视角看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发展的得与失

(1)前30年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巨大代价。

主流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具体表现为:接收和改造了旧大学,创办了一批新大学,初步形成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学界却对此有所质疑,那就是在"破"了一个具有相当成就的高等教育体系后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体系并没有真正"立"起来。但如果超越具体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得失,着眼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长远历史,或许我们应该特别肯定这一时期通过"隔断"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紧密联系,建立了一个自主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设定的结构性框架,避免了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可视为一种制度层面上的"创造性破坏"。至于"立"起来的这一体系的成败得失,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对于前30年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界强调最多的是:毁灭了一批优秀机构,破坏了正常的制度,降低了高等教育质量,走了弯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称前30年所"破"的是一批好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和震旦大学等)、一种优秀的学术教育传统(如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而所"立"起来的高等教育的思想、制度与实践与高等教育国际主流格格不入,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些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似乎并未抓住根本问题。如果基于国家层面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宏大视野,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段历史对高等教育后期持续健康发展形成的障碍:强调"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导向而非经验主义导向,导致在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好大喜功和迷信将来;而过强的政府控制取代了市场调节,严重压制了学校的自主性,最终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组织失灵;过细的计划管理既导致了资源的误配,也束缚了高校的自主创造性,阻碍了教育家的出现;无处不在的"重点建设",导致高校地位固化,高等教育系统因缺乏竞争而活力不足,既压制了普通高校的发展空间,也抑制了重点高校的内生发展动力;发展至上的思想催生了发展主义,强化了对数量指标的过度关注,导致对绩效合法性的过度追逐,恶化了学术与教育生态;以领导讲话、指示和政治动员的方式推进改革与发展,强化了人治,造成了对"运动式治理"的依赖。正是在这种强大的计划体制的支持下,我们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独立建构,并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正是这一体制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

(2)后30年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巨大代价。

在后30余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与重视的重大问题。这一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已逐渐融入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正常发展。从体系建设上看,初步形成了一个层次类型多样、区域分布基本合理、办学特色逐步显现的高校体系,能够自主培养从半熟练专业人才到高级专门人才的各类专业人才;从法律与制度建设上看,恢复了高考制度、纠正了过去"条块分割"的问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建立了学位制度、科技创新制度和其他有关管理制度等,高等教育初步走上法治化轨道;从学校发展上看,加大了对高校的投入、逐步赋予高校部分自主权、鼓励高校对外交流、鼓励高校进行科学研究、鼓励高校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等。

但后30余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学界关注最多的是:政府主导根深蒂固,计划控制难以逆转,市场的调节作用、高校的主体性难以发挥,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活力被抑制;过分强调数量指标,制约了质量与水平的提升,阻碍了高校的转型发展与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重点建设带来的畸形发展难以矫正,高校之间缺乏公平竞争,高等教育体系缺乏活力;绩效合法性的强化诱发了普遍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术与教育生态持续恶化。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属于前30年发展的后遗症。

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自主发展危机的凸现。当前,全球化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化也已经形成。全球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获得高端产品的全球市场,后发国家则被边缘化。在全球教育服务贸易一体化和前30年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的后遗症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依附性发展的危机逐步显现。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西方经验的模仿,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对既定体系的服从之中——我们基本上只能扮演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角色,未能成为国际体系的创造者,导致高等教育发展主体性的弱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前往发达国家,西方的学术与教育标准甚至西方的学术与教育话语体系,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学术与教育,我国的学术与教育将陷入西方主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导的结构化体系中难以自拔，未来高等教育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或许会愈演愈烈，再次被边缘化也并非不可能。

2. 走上理性发展道路的可能与条件

(1)赶超型发展的两难困境。

从理论上来说，后发国家要摆脱边缘化困境，必须走赶超型发展的道路，但走上这条道路后，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在森哈斯看来，绝大多数赶超都难以取得成功，过去如此，未来依然如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内部发展条件如政治经济制度、基础教育与国民素质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分工体系中占有越来越强的优势地位。内部有利条件与外部优势的共同作用使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被强化，这也意味着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被放大，加大了其赶超先发国家的难度。如前文所述，森哈斯认为，后发展国家走出边缘化困局的关键在于能否自主实现与国际体系的“隔断”式发展，但之后的发展要取得成功，需要满足苛刻的前置条件，所以多数赶超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在现实中，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其实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与国际体系隔断，这可以使发展的主体性得到保障，但很有可能带来被孤立的后果；二是选择融入国际体系以期分享国际资源，但有可能陷入发达国家所设计的结构化体系之中，从而带来被边缘化和依附性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两难选择。

(2)实现理性发展的可能与条件。

指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可能面对的巨大困难，并非说等待后发国家的只有失败的命运。发展经济学和后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后发展是有其特定优势的。一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由于缺乏某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后发国家可以创造出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化结果。替代性的意义在于使后发国家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二是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从而有可能缩短初级现代化的时间，较快进入更高的现代化阶段。但是，落后国家并不自然具有后发优势，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后发优势可能转换为后发劣势。

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走出两难困境的关键在于根本发展模式的转变。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只能从治理现代化入手，超越低度现代化治理的发展模式，加强基础条件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提升要素水平，同时尽力规避各种激进赶超模式的诱惑。虽然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的突出差距体现在高校办学及高等教育产出端，但产生差距的根源不在学校办学层面而在宏观治理层面。这就意味着后发国家必须同时推动高等教育宏观治理转型和高校发展转型。高校发展转型是最终落脚点，没有高校的发展转型，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与质量水平的提升都是空话；高校发展转型有赖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转型，如果不尽快实现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向宏观治理的转变，发展转型就不可能完成。具体而言，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的宏观治理必须实现三大转变：从政府统包统揽向着力激发区域和高校自主办学活力转变，从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向切实支持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转变，从过分依赖口号、指示的“运动式治理”向更加依赖法治的现代治理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32)：110-114.

[2]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 中国教育报，2015-07-31(02).

[3] 余颖.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表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分三步走[N]. 经济日报，2015-11-06(03)

[4] 杨鲁慧. 东亚地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因及面临的挑战[J]. 求索，1999，(1)：17-19.

[5] 吉粉华.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及其调整研究[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60-64.

[6] 陈平原. 中国大学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8，14.

[7]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 王建朗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6.

[8] 别敦荣. 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前言》[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6)：50-55.

[9] 张应强. 关于将高等教育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的思考[J]. 江苏高教，2015，(6)：1-4.

[10][11] 梅俊杰. 后发展学说与中国道路——以迪特·森哈斯的研究为视角[J]. 国外社会科学，2015，(1)：69-77.

[12] 李孝营. 建国以来党在处理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J]. 理论研究，2001，(3)：24-26.

[13]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 新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史纲要(初稿)(专辑一)[J]. 计划经济研究，1984，(10)：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47.
[14][28][30][32] 张应强. 精英与大众——中国高等教育60年[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0-30,26,30.
[15] 谢作栩.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39.
[16] 刘志铭,郭惠武. 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变迁——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J]. 财经研究,2008,(2):19.
[17]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G].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24.
[18] 罗平汉. 1958年的"教育革命"[J]. 党史文苑,2014,(19):27-34.
[19]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G].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234.
[20] 刘洋. 1958年"教育大跃进"[J]. 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7,(19):35-38.
[21] 陈学飞,展立新.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反思[J]. 高等教育研究,2009,(8):1-26.
[22][23] 曲仕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3,433.
[24] 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J]. 社会学研究,2005,(5):154-181.
[25] 左进峰. "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的教育革命[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4):55-62.
[26] 周全华.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D]. 中共中央党校,1997:34-35.
[27] 刘海峰,史静寰. 高等教育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04.
[29] 杨柳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转变概述[J]. 沧桑,2010,(2):72-73.
[31] 吴玉敏. 演进与深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丰富与拓展的历史轨迹[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3):61-71.
[33] 刘献君,张晓冬. "少年班"与"精英学院":绩效诉求抑或制度合法化[J]. 现代大学教育,2011,(5):8-15.
[34][35] 任一明. 新中国成立50年间高等学校几次重大调整简论[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20-25.
[36] 曾世宏. 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演进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J]. 改革与战略,2009,(8):39-43.
[37] 庞元正. 现代化赶超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J]. 天津社会科学,1996,(1):6-8.

(本文责任编辑　童志勇)

·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西南大学博士生　郭平　　导师　顾海良 崔延强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2012年5月

大学作为传承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将承担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课题。本文以现代大学制度为视域,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中心,以大学内部治理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力图深入分析和论证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这对矛盾,对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分析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成因、演变与现状,阐明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确立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基本命题,提出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构架。力图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式构建,达到对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具体实践的指导。基本思路是:建立"董事会(理事会)框架内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健全"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师生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形成"党委政治权力、校长行政权力、教授学术权力、师生民主权力"的协调运行机制。

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国内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透视。首先进行归纳总结,将国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划分为三种模式进行分析。其次,分析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要素的现状与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大学及其本质进行探讨。二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架构。分析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阐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董事会(理事会)框架内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三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党委领导。分析我国公办大学内部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必然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问题分析,提出健全完善党委领导的运行机制的路径。四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校长治校。分析校长治校是大学内部治理的关键,校长治校的机理分析,大学理念与校长治校模式,健全校长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五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教授治学。分析教授治学的历史演进,教授治学的内涵与本质,我国大学落实教授治学的必要性,落实教授治学机制的路径。六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分析大学章程的内涵与特征、大学章程对于大学治理的意义,分析大学章程中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提出通过大学章程完善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